



文通汗代

李正西◎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文通译传

李正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支遁评传/李正西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80254 - 193 - 1

I. 支… II. 李… III. 支遁(314 ~ 366)—评传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691 号

**支遁评传**

**李正西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30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193 - 1

**定 价:** 30.00 元

---

禪數支祖，中之支道與支遁，何許好處來以據尚而。土長  
數姑，祖子一孫。土良土平威信熱妙，玉潤其益而益高微  
不盡，中之方支祖丈。支遁直音一，卦其封參譲大義又斷  
。清之宋二千聖諭神照草真節不群  
舉萬美，以名之曰圓音。蓋以靜斷祖士空相合蓋

。是故

。起始之未西子道非不群不盡，堅音恭起，卦故出自  
《卷三》。崇子崇祖丈，既而生於《卷三》。弘明——  
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來紹明大法，  
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

——晋· 郁超《与亲友书论支道林》

自佛教入中國後，由漢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聞。西晉阮、庾與孝龍為友，而東晉名士崇奉林公，可謂空前。此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風神類談客。而“支子時秀，領握玄標，大業冲粹，神風清蕭”（《弘明集》引日  
燭中語），故名士樂于往還也。

此文（支遁“逍遙論”）不但釋《莊》具新義，并實寫清  
談家之心胸，曲盡其妙。當時名士讀此，必心心相印，故  
群加激揚。吾人今日三復斯文，而支公之氣宇，及當世稱  
賞之故，从可知矣。

——现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蓋支遁之所異于向郭者，向郭言無待，而支遁則言至  
足。至足本于無欲，欲無欲，則當上追嵇阮，以超世絕俗

为上。而向郭以来清谈诸贤，则浮湛富贵之乡，皆支遁所谓有欲而当其所足，快然有似乎天真也。游心不旷，故遂谓尺鷃大鹏各任其性，一皆逍遥矣。及闻支氏之论，遂不得不谓其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

盖当时名士所谓情性自得者，其内心不忘俗，浅薄率如是。

自此以往，庄老玄理，遂不得不让位于西来之佛法。

——现代·钱穆《庄老通辨·记魏晋玄学三宗》

《林泉文集卷之六》跋语·音——

林泉文集卷之六，前半云由，后半中人林泉自系而，支流又奉已意，或音西，附立未竟，入林泉事。昔，劉惔志在林泉，不競其出，而空附下，公林奉崇士深音支“西”客炎炎林泉，(五)《秦》林泉思源，林泉外世根实日长(《秦阳序》)“萧索林泉，林泉正大，林泉墨融，羲和子”。出至林子承士深处，(秦中烟霞)林泉实书，其谱具《五》舞道不(“萧索林”敷支)文此始，甲附乙以之，此斯士名林泉，其琴曲，林泉之客寄林泉告其，卒产之公支而，文祺莫三日令入音。林泉歌林泉，美谈下从，林泉音《秦阳清风》南音西跋语·音——

主言林泉支而，林泉言林泉，林泉由于林泉多敷支而，林泉多敷支，林泉主工音调，海子林，居天下本洪生，又

## 著者简介

李正西，任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中国散文艺术论》、《梁实秋诗歌创作论》、《朱蕴山传》、《道德经评注》、《楚辞·天问注》、《菜根谭评注》、《围炉夜话评注》、《儒趣百图》（合著）、《千古祭文赏评》、《教我如何不想她》、《沧浪集》等。

主编《中国新时期散文精选评析》、《中国新时期诗歌精选赏析》；副主编《新时期文学》、《中国文化世家·江淮卷》、《安徽文学50年·散文卷》；合著《中国文化名城——亳州》、《中国梨都——砀山》；编选《梁实秋文坛沉浮录》，发表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散文与小说的论文及散文、随笔数百篇。点校完成《中华大藏经·禅门宝藏录》。

在海内外多家报刊分别开设过“文坛风景线”、“禅悟随笔”、“中国当代作家”专栏。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论述东晋高僧、佛教思想家支遁的开创性的著作；  
这是一部学术价值丰厚的著作；  
这是一部可以感受东晋文化形态的著作；  
这是一部可以欣赏佛玄诗文的著作。  
这是《支遁评传》这部著作提供给我们的。  
著者依据可靠的资料，以长期从事教学和文化研究的经验，介绍了支遁的生平、佛学宣传与活动，评析了支遁对“三玄”的钻研，评论了支遁的佛学思想和佛学诗文创作。  
著者在写作过程中多方收集史料，集腋成裘，爬罗剔抉，披沙拣金，极用费力，将支遁放在东晋的社会环境之中，放在与当时名士、高僧的交往之中，写出了支遁丰富的精神世界，勾勒出了支遁对后世佛教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影响，画出了支遁这一位精通老庄哲学，并以老庄哲学打通通向佛教般若学道路的文化名人的风采。

莫非是曹植那句“七言晋宋，上对矣。歌向人头舞足，使千人唱大曲”。孙策之子孙权，曾有“卿本名士，好为幽玄，不以文辞见长，而以清谈著称，故时人号之‘江东第一贤’”。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中，诗、词、赋、骈文、散文、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竹林七贤”，他们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的虚伪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的代表人物嵇康、向秀、山涛、刘伶、阮籍、王戎、桓温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

## 读《支遁评传》所想到的(代序)

熊礼汇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精英。他们创造的精英文化许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要深入探讨、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对各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作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对历代文化精英的研究亦有方兴未艾之势。但观其发展趋向，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还不尽合理，往往对在历史上起“正面”作用的人物研究得多，对在历史上起“负面”作用的人物研究得少；而所谓的“正面”、“负面”，本来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再就是对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或历史名人研究得多，对一些被种种浮尘迷雾笼罩的重要人物却关注不够。这种情况也显现在对东晋文化精英的研究中。

说到东晋的文化精英，不能不顾及当时十分活跃的名士、名僧。正是他们创造了东晋卓有特色的文化。而其中佛玄文化的形成对南朝以降，特别是对隋唐佛教文化的进一步中国化起有引领作用。可是，今日研究东晋文化，讨论得最热闹的恐怕只有一个陶渊明。而诸多名士、名僧多被当代学者久久悬置

于外，以致无人问津。实际上，东晋名士、名僧中对东晋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在陶氏之下，甚至堪称东晋主流文化代表的大有人在，支遁就是一位。

在东晋文化史上，支遁最重要的身份是佛学家。他对佛教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努力使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他建立的“即色宗”和道安、道潜建立的“本无宗”、支愍度建立的“心无宗”，同为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与道安、慧远等同为东晋将玄学义理、思维方式融入佛教研究的高僧，而他在士林的声望，则为诸僧所不及。时人郗超即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sup>①</sup>亦如汤用彤先生所说：“自佛教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西晋阮、庾与孝龙为友，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而‘支子时秀，领悟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sup>②</sup>，故名士乐于往还也。”<sup>③</sup>

支遁又是著名的玄学家。孙绰作《道贤论》评论说：“支遁、向秀，雅尚老庄。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又说支遁是“识清体顺，而对于物，玄道冲济，与神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与向秀不同的是，支遁好《老》、《庄》，是将《老》、《庄》之说与般若学融为一体，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东晋玄学的新变特色。东晋初年，玄学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名士谈玄多在魏晋玄学传统命题内兜圈子。如史载，王导过江就只道声无哀乐、养生、言不尽意三理而已。支遁以佛释玄，特别应用

<sup>①</sup> 郗超《与亲友书论支道林》。

<sup>②</sup> 《弘明集》引日烛中语。

<sup>③</sup>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两晋之际名僧与名士》。

他般若学的义理、思维方式解说“三玄”著述中的重要命题，于王、何、向、郭之外自成一家，其说拔新领异，使众多名士为之叹服。

如《世说新语》文学第32条记载：

《庄子·逍遥游》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之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皆是众多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随用支理。

钱穆先生对名士们为什么认为支说为“标新理于二家之表”有个说明，他说：

盖支遁之所异于向郭者，向郭言无待，而支遁则言至足。至足本于无欲，欲无欲，则当上追嵇阮，以超世绝俗为上。而向郭以来清谈诸贤，则浮湛富贵之乡，皆支遁所谓有欲而当其所足，快然有似乎天真也。游心不旷，故遂谓尺鷃大鹏各任其性，一皆逍遥矣。

不及闻支氏之论，遂不得不谓其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

盖当时名士所谓情性自得者，其内心不忘俗，浅薄率如是。

自此以往，庄老玄理，遂不得不让位于西来之佛

法。<sup>①</sup>

于此可见，支遁谈玄，并非简单地标新立异，而是会通般若

<sup>①</sup> 钱穆：《庄老通辨》下卷《记魏晋玄学三宗》第325至326页。

学的“空无说”与玄学的“贵无说”，构建佛玄相融的宇宙本体论，并以此为依据，对社会和人生以及修身养性的方法提出新的见解，从而将对玄学义理的探讨和现实人生紧密结合起来，使东晋玄学的发展活力激增。

支遁不但以佛释玄，而且能将其说“了然于口”，是东晋少数几个清谈高手之一。从《世说新语》文学门的有关记载可知，支遁对东晋清谈艺术水准的提升是有重要贡献的。他除将以佛释玄的诸多义理引入清谈以充实其识见以外，还对清谈言说形式有过改进，对清谈审美境界有过明确界定。他曾将僧人讲究“声、辩、才、博”的“升坐唱导”的讲经方式引入清谈，因而带来谈风的变化。支遁谈玄，自陈其说，从容言之，或“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sup>①</sup>或“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sup>②</sup>或遇人“屡设疑难”，亦“辩答清晰，辞气俱爽”<sup>③</sup>。东晋清谈作长谈者多，且“辞条丰蔚”，言之“一往奔诣”，与魏、西晋谈玄尚简，以“约言”为美略有区别。魏晋谈风由简趋繁之变，不能说与支遁等人在清谈固有言说方式中引进说经手法无关。

至于支遁对清谈最高审美境界的界定，可参看《世说新语》文学门第38条。该条记载，许询年少时，人以王修作比，许不服气，“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又赞誉门第92条言：“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刘注云：‘苦谓穷人以辞。’”可见，支遁是将“理中”作为清谈的最高境界的。

<sup>①</sup> 《世说新语·文学》。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

所谓“理中”就是析理切中要害，说得透彻、明朗。“相苦”之辩则属于意气用事、争胜之举。支遁倡导“理中之谈”，既是对清谈最高审美境界的界定，也是对一种不良谈风的纠正。其主张得到众多名士的支持，如谈友王濛也是“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往往有高致”<sup>①</sup>。或谓清谈论辩以“理中之谈”为贵，为当时众多谈士之共识，但一再倡导、明确标举其说的应是支遁无疑。

支遁还是东晋勤于写作佛玄诗文的作者。所谓佛玄诗文，指的是阐释佛理、玄理的论文和佛理诗、玄言诗。前者如《即色论》、《大小品对比要抄序》、《逍遥论》等，后者如《咏怀诗》、《述怀诗》、《五月长斋诗》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佛玄诗的艺术精神出自以佛入玄的玄学理论和佛学理论，而其抒发领悟佛理的感受，则多将山水描写纳入其中。这种写法实开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之先河，清代著名学者、“同光体”著名诗人、王国维的老师沈曾植就说：“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海日楼文集·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又说：支遁的诗“模范山水，固以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支、谢皆禅玄互证。”“谢故犹留意遗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sup>②</sup>

总之，支遁于佛于玄于文于诗都卓有建树，对东晋暨南朝文化影响深远，是一位值得当代学者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不能说当代学者对支遁的文化建树没有研究，对某些方面的个案研究是有的（如对般若学的研究），而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深入，但对支遁其人其学其诗其文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却是全新的课题。

<sup>①</sup> 《世说新语》赏鉴门第133条注引《王濛别传》。

<sup>②</sup> 《海日楼文集·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

近日读到李正西教授的书稿《支遁评传》，真叫人喜不自胜。一喜当代学者终于有人来全面研究支遁其人其学了；二喜老友正西教授退休以后横刀跃马，驰骋学苑，尚有如此魄力和锐气。当然，最可喜的是《支遁评传》确实是一部对支遁其人其学其诗其文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作深入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著者的不少见解的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东晋文化精英确实深有启发。

《支遁评传》介绍了支遁时代的特点，特别对东晋佛玄消长、彼此融合、各臻其盛的情形作了说明；深入评析了支遁一些重要的玄学观念（纳佛入玄）和佛玄义理（以般若学为重点），勾勒出支遁和东晋诸多名士、名僧学术交往的轨迹，对他的佛玄诗文，特别是玄言诗的艺术精神、表现技法及其对南朝山水诗发展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论述。此外，还对支遁卒年的传统说法作了订正，对支遁和浙东茶文化的渊源关系作过探索。其内容之丰富，几乎涉及支遁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为难得的是，著者并不以复述支遁生平故事为能事，而是把气力用在对支遁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理性分析上，将支遁置于东晋乃至中古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来分析支遁现象的成因，搜寻其本质特征，揭示其历史意义，提出了不少见识高明而又切合于实际的学术观点。

比如说：“公元346年何充去世这一年，可以看作东晋佛教第一阶段的结束。”何充去世，竺道潜和支遁等高僧在京师失去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持，纷纷逃离，隐迹剡山。十八高僧如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等也都聚集到沃洲山和石城山，十八名士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也都望风影从而来，在沃洲山和石城山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

“支遁能够在佛学思想上领袖群伦，与佛教中心的转移密

切相关。正是在佛教中心转移的过程中,支遁的佛学思想和文学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和彰显出来。”唐吉寿,《晋书·支遁传》

如说:“支遁也正是在这种僧人和名士共同研习讨论‘三玄’的氛围中;在名僧参酌‘三玄’,阐释‘般若学’的氛围中;在名士依据‘三玄’,发挥‘玄学’,以致名僧与名士超凡脱俗,逍遥放达,相互标榜的氛围中,让般若学放了异彩。”“其独特之处,正如王濛评价的,‘雅尚老庄’的支遁是‘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弼)’。”吴长风著,《晋书·支遁传》,见《晋书》卷八十一。

“反过来说,支遁是站在佛学特别是般若学的立场上看待老庄、周易和王弼学说,因而可以区别于玄学专门家,得出崭新的见解,得出崭新的结论。老庄思想和玄学语言正是通向佛教般若学的桥梁。由于运用老庄思想和玄学对般若学的精彩解说,所以支遁才被推崇为杰出的佛学思想家。”见《晋书·支遁传》。

如说:“在东晋,佛教的传播得到了普及和深化。特别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与老庄哲学的结合,使魏晋的‘玄风独扇’转变为‘玄佛交融’,并且形成了佛教般若学的宗派,从而标志着佛教真正地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确立了此后佛教中国化的基本走向。”见《晋书·支遁传》。

如说:“支遁的佛玄诗从缘起性空,心境的空明无妄去理解自然和大千世界,去理解万般法相背后的深邃的永恒。从缘起性空,从空明无境之中去理解自然、社会、人生,生发激荡,融合为天地、性情、心境相通相感的山水精神和空灵境界,就造就在林泉争涌的山水风物之中,体现出抱朴含真的生命情感之中的自然之道。”见《晋书·支遁传》。

这都是一些颇具宏观意识、理性认识的独到的分析和说明。他如对支遁“即色论”要义的概括和说明,对支遁“即色游玄思维”特点的介绍,对支遁佛玄诗文艺术成就的肯定,都能见

出著者学术积累的丰厚和识见的深邃。

读《支遁评传》，读者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收获形式则可能有两种，一是直接领受著者所言之理。比如上引书中对诸多问题的论述，它们因言人之所未言，或于人所已言之外另有所见，都能增长读者的知识（包括修正某些观念，和纠正某些常识）；二是从书中所述之事领悟其理。比如，读书中所引《世说新语》轻诋门第 24 条及注所言支遁每至讲肆，“每标举会宗”，“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而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雋逸”又读所引《世说新语·言语》第 76 条所言“支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所引《世说新语·言语》第 76 条，还记载有支遁的另一轶事：“支公好鹤，住剡东嶧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若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再读所引支遁《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对“或以专句推事而不寻况旨”的批评，即可知支遁察物观人有一知神重于知形的审美趣味，不但品评马、鹤贵得其神、善识其志，而且读书、治学强调领会要义，推寻“况旨”，在把握精髓、明辨至理上下功夫。此外，我们读书中对支遁《逍遙论》、《大小品对比要抄序》的分析，又知支遁不但治学重在探求理致，作形上之论，而且思考问题长于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找到不同学派、不同学术主张相通相融之处，使两者彼此渗透、相互吸纳，对不同学派的传统命题作新的诠释。这样“任心独运”，摆脱羁绊，打通墙壁说话，突破定式作论，自会新义迭出，超越时论。看来，学术的创新离不开思维方式的创新，离不开解析角度的更换。今人如此，古人亦然。支遁的成功就是有力的例证。

读《支遁评传》，能使人于深知支遁其人之外另有所悟，自与著者严肃的写作态度和比较合理的著述方法有关。首先，著者写作《支遁评传》已经超出了陈寅恪所说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读报告》）的阶段，达到了平心而论的境地。所谓平心而论，是指对古人学说的评论，不但顾及其人生存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文化环境）及其学说提出的针对性，且能屏除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影响因素，对古人文说作实事求是的公允评价。由于平心而论，故传写其事力求全面、客观，使人知其事能有所悟；论断其理则力求平实稳当，使人明其论断而心有所契。

其次，著者对支遁学说的理解和评论，虽然参考过古今众多学者的意见，但更多的是出自对支遁原著的反复咀嚼和仔细考量。为了写好《支遁评传》，著者曾对支遁诗、文一一作出注释和翻译，写出了相当详细的评析文字。这是极为费力、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我读过这些文字，深为著者治学的认真态度所感动。可惜因为书稿篇幅限制，这些文字未能全数收入书中。由于见识从体味文本中来，故其言之有据，且多能切中肯綮，绝非空中盘旋，虚妄作论，或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者所能比。（在此我有一个建议，希望著者能够对支遁诗文的注译做进一步加工，争取尽快公开出版。那样，我们既能读到《支遁评传》，又能读到它的姊妹篇《支遁诗文译释》，对支遁的认识就会更全面更具体。）

第三，《支遁评传》的写作还有一个人所难及的特点，即《支遁评传》的写作是著者在支遁生前长期频繁从事学术活动的浙江省新昌县完成的。新昌县原为古剡县的一部分，山水文化积淀很深。东晋以还，历史上许多文化精英都在这里久久盘桓，留下千古佳话。其地的沃洲山和石城山更是东晋以还浙东佛

教文化中心之一。支遁一生的学术生涯也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著者能长住此地作支遁研究，实在是一大幸事。无疑，这种实地体验式的研究，必然会加深著者对支遁其人其学“了解之同情”，也更能使之走近支遁之心，因而使所“评”所“传”的支遁，也更能接近其本来面目。

第四，《支遁评传》的表述方式也自有其特点，既不离开本事凭空作论，也不一味铺叙生平事迹，而是评不离传，传中有评，两者交相为用。又为了说得深入、清楚，采用了专题分述的方式。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展示相关材料，又有利于集中探讨、剖析某一学理。显然，其表述方式系因应支遁思想文化多元特征而设。但它带给读者领受知识、领悟道理的方便，可能是著者始料未及的。

通读《支遁评传》，深知正西教授文史兼修，知识面宽，思维敏捷、缜密，能思辩，会分析，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明白易晓。但由于支遁思想博大、深邃，其文献研读、理解的难度很大，故所言难免事有疏漏，意有乖违之处。又正西教授对散文艺术颇有研究，而且擅长写作白话散文，可能是习惯使然，他写《支遁评传》，常不经意地用到散文笔法，致使有些章节布局、行文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古人作文，有文风与所论对象一致一说。前已言及，支遁解经谈玄，务求“理中”，而出言“一往奔诣”，“辞气俱爽”，“情理俱畅”，以致“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其佛玄论文简洁、严密、明朗、畅达。作《支遁评传》似以追求此种文学色彩为宜，不知正西兄以为然否。

2009年6月24日

于武汉大学文学院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